

第三十三讲

长篇小说青年近卫军和法捷耶夫在
战后时期的活动

本讲参考资料：

1. K. 捷林斯基，A. A. 法捷耶夫，苏维埃作家杂志，莫斯科，1956年。

2. E. M. 柯罗里可娃，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莫斯科，国立教育出版社，1956年。

E. И. Королькова。"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A. Фадеева，М.，Учпедгиз，1956。

讲授提纲

1. 在伟大卫国战争年代的A. 法捷耶夫的创作。

а) 长篇小说青年近卫军。

2. A. 法捷耶夫在战后时期的活动。

1. A. 法捷耶夫在伟大卫国战争年代的创作

A. 法捷耶夫象其他一切身强力壮的、能够参加对敌的武装抵抗的苏维埃作家一样，在伟大卫国战争的日子里他到了前线。1941—1943年间，在报纸和杂志上，以及前线的报纸上刊登了他的特写和政论文。他特别注意和敌后游击运动有关的一些事实。在1941年7月11日刊登在真理报上的论文游击战的英雄们里面，A. 法捷耶夫写道：“毋庸置疑，在敌人侵占的一切苏维埃地区上，不久即将燃遍游击战争的烽火……苏维埃人民高度尊重游击英雄，如恰巴耶夫，科托夫斯基，波任珂，柯楚别依以及其他许多人的神勇式的功绩。”

在法捷耶夫描写苏维埃战士的军事劳动的特写和论文中也

逐渐积累起了一些材料，这些材料后来凝结成为他的傑出的青年近卫军一书中的艺术形象。

A. 法捷耶夫不得不在被敌人封锁了的列宁格勒居留一个很长的时期。在这一个英雄城里他遇见了千百个普通的苏维埃人，他们每天的劳动都是一种功绩。描写被包围的城市及英雄生活的各个方面的一些特写形成了特写式的中篇小说列宁格勒在被包围的日子里。在小说里他写到和列宁格勒的作家和诗人们，基洛夫工厂的工人们，和狙击手及其他许多人的会见。“我和许许多多这样的人通宵达旦地倾心地谈着我们整个的生活和斗争。我可以说，最伟大和最完美的东西，列宁格勒在几个月的斗争里锻炼出来的东西，就是他们这些人，即来自当地的工人、职员、知识分子群中的先进的人，……他们这些人乃是一种最高的精神力量，它以生动的、历史的、富有人性的思想充实了所有的人，并推动着所有人前进、前进”。（A. 法捷耶夫，列宁格勒在被包围的日子里，莫斯科，苏维埃作家杂志，1941年，144—145页）

这样，正如高尔基说的，逐渐累积起了点点滴滴的生活印象。后来由此产生出青年近卫军里面的卓越的英雄形象。

1) 长篇小说青年近卫军

这部作品，由於它的思想艺术特点，在苏维埃文学史上佔着特殊的地位。“青年近卫军一书，——作者写道，——是不能理解为一部普通的长篇小说的。在这一部有着大量的真事真人的长篇小说里也有作家的虚构和幻想及艺术的推测。”（K. 克里姆斯基，书籍和生活，1947年3月20日共青团真理报）

作为长篇小说基础的是一些著名的历史事实。顿巴斯的一个城市克拉斯诺顿在解放以后，发现从1942年9月起就有一

个规模很大的青年地下组织“青年近卫军”在那里活动。在解放前不久它几乎全部（56人）被法西斯匪帮惨杀了。许多青年男女都被活活地投入了矿井。共青团员奥列格·柯歇伏亦领导了这一组织，他也死於侵略者之手。

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的特别委员会花了半年的时间收集了三卷有关“青年近卫军”的材料，如证件，供词、文件等。根据这些材料颁布了追赠五个青年近卫军以苏联英雄的称号的命令，并奖给该组织的四十个参加者以国家勋章。

共青团中央授意法捷耶夫，要他创作一部描写克拉斯诺顿英雄的成长作品。作家在青年近卫军等人身上立刻看到了所有的苏维埃青年的勇气和精神美的体现——是多久以来关于完美的新人的理想的生动体现。

作者到克拉斯诺顿去，花了一个半月的时间，亲自去了解环境和人物，收集更多的新的材料。他和被杀害了的英雄们的家属，和还活着的地下组织的参加者谈了话，研究了他们的生活细节，没有这些细节是不可能正确地创造出这部艺术作品。

长篇小说是在1945年写成的，在小说里作者用语言的艺术力量重现了苏维埃人，男女青年，他的母亲以及老同志——共产党员的活生生的形象，揭示了他们的精神世界。而被激动到灵魂深处的我们，密切地注视着我们所熟悉的历史事件的每一个变化而不忍放下书来。在读完了最后一页以后我们还长时期感觉到书中的英雄如在前并且思虑着他们的命运。他们成为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常以他们的伟大事业来衡量我们的行为。

在克拉斯诺顿的青年爱国者组织的历史中法捷耶夫看到了

如此的诗意，历史的伟大和戏剧性，这些事实本身就是一首伟大的文明史诗。

只有法捷耶夫这样的人才能用一个战成们，近似这些人的作家才能理解和感受这些人的每一个精神活动。

法捷耶夫放弃了在事实的背景上任意创造艺术形象的可能，而阐述了事实的本身。他写的是真人真事，说出了真名实姓，在他的作品中强大的艺术力量结合着正确的毫无有碍的历史。

青年近卫军是一首真正描写英雄青年的长诗。长篇小说所包括的时间是从1942年9月到1943年初。在这个时期德国侵略军已到达了伏尔加河，正在斯大林格勒附近进行着激烈的战斗。就在这个时期斯大林格勒的战役决定了人类的命运。

这一本书的主要英雄都是16—19岁的青年男女，这些青年正站在学校与独立生活的交界处，还只刚刚走进世界，刚刚开始感觉到自己的日益强壮起来的力量和初恋的欢悦。

在长篇小说的主要人物中我们看到了许多青年，但是着重指出的则有奥列格·柯斯秋林，伊凡·席姆奴霍夫，郭丽亚·葛洛摩娃，谢尔盖·耶列宁，刘波芙·谢夫卓娃，阿那托里·波戈夫等人。

作者自己感觉到，也使我们感觉到这些人的青春的气息，他们在克拉斯诺顿这一小矿区城里的毫无拘束的蓬勃发展。他们还没来得及脱离童年时代而就不不得不和敌人进行殊死斗争了。他们还没有进入克拉斯诺顿，而他们已经感觉到在他们身上有着何等重大的责任。

这些青年人在富有戏剧性的环境里接受了进入成年时期的考试，考试的成绩是优秀的。在这里充分显示了英雄青年的性格，这种性格是在苏联的二十五年的历史时期中形成的。

法捷耶夫曾给这一代的人以这样的描述：“似乎最难以联

站在一起的特点——梦想和实践，幻想和实际，热爱良善和严峻无情，胸襟开阔和精明打算，对世间乐趣的热爱和自我克制，——这些似乎难以连结起来的特点合在一起就创造了这一代的独特面貌。”（水夫译，青年近卫军，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54年，第264页）

在“青年近卫军”的组织里有一百多人。在长篇小说里详细地提到了其中的数十人。他们在气质上，在外表上是极不相同的，但是共同的恨和共同的爱团结了他们。

郭丽亚·葛洛摩娃是一个外表上很镇静的，甚至还稍微有点苛刻和严厉的姑娘，在她身上充满了巨大的内在力量、集中的思想蕴藏着暂时处于平静状态中的激情的火焰。

在郭丽亚·葛洛摩娃的日记本里记下了这些话：“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是应当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耻。”（H·奥斯特洛夫斯基）（见上书，第425页）

当她决定去和德军进行斗争的时候，郭丽亚说：“我明白了，我没有别的路，是的，我只能这样生活，不然我就根本无法生活。我对我母亲发誓，我只要有一口气，我决不离开这条路！”（见上书，第421页）

作者用很多篇幅着重描写了郭丽亚·葛洛摩娃的美，她的精力充沛的眼神，淘气的笑容。她长得健康、体格匀称。机智敏捷，梳着又长又黑的辫子——她整个人是幸福、爱情、生活的化身。同时她也是一个成熟的、好读书的性格坚强的姑娘，许多人生的大问题激励着她。

在监狱里，她表现出了刚毅的精神，她安慰同志们，为她们朗诵莱蒙托夫的诗恶魔，直到最后一息她始终是忠于人民。

忠于苏维埃制度、忠于苏维埃社会的思想的。

作者也详尽地描写了另一位姑娘刘巴·谢夫卓娃的活动。她的女友们和同志谈到她时这样说她：“女演员刘勃卡，象狐狸一样狡猾。”（见上书，336页）

她在无线电员侦察兵训练班毕业，准备到敌人后方游击队里去工作，但是她在被德寇占领了的克拉斯诺顿站下来了。

她是一个真正的演员，珍爱自己的才能和表演，善于推断人的性格。她身材匀称、轻快敏捷，“象火焰一样”，有着大无畏的精神，充满了生命的活力，甚至在法西斯监房的刑讯室里她也没有丧气——她孜孜不倦地行动、策划。

游击队指挥员，布尔什维克地下工作的组织者伊凡·费奥陀罗维奇称她为“聪明的姑娘”。

刘巴把欢乐分散给她周围的人们，她的鲜艳夺目打动着他们。“这种鲜艳的印象是由于她的绚烂夺目的衣服而来的：天蓝色底子的绸纱上绣之地会是什么红的樱桃、绿的豌豆，还有什么亮晶晶的黄色和紫罗兰色的亮片。朝阳在她的头发上闪耀着……那件灿烂夺目的衣服是那样合身地裹住她的腰肢，而且那样轻盈飘逸地罩住她的穿着肉色袜子和精致的奶油色高跟鞋的匀称丰腴的双腿，所以这个姑娘全身都流出一种非常有他的、活泼的、轻盈的、柔若无骨的感觉。”（见上书，333页）

同时她却具有着不屈不挠的意志，坚定的信心，执行着“青年近卫军”总部的最危险的任务。

她的朋友谢辽查·刘戈萧夫是这样的人。“他的脖子晒得黧黑、耳朵大而好看，嘴生得秀气而有英勇气概，他的两道眉毛互不联在一块，它们在靠鼻梁的地方生得比较密，甚至在鼻梁上也长眉毛，但是眉翼却比较细，比较稀少，略微弓起，就在这里的翼尖上形成了脸上的有力的皱纹。”（见上书350页）

同志们都称伏甫夫为“金黄色的头”，他是积极参加游击队突击行动的一个。

但是特别吸引人，特别真实的是谢尔盖·邱列平的形象。

法捷耶夫在描写奥列格·柯斯坎同他第一次会面时说：

“除了华丽丝和斯巧巴·萨方诺夫以外，小花园里还有一个奥列格不认识的、瘦削、赤脚、又髯又硬的淡色头发偏斜分开、嘴唇有点翘的青年。那青年默然地坐在槐树干的分杈中间，从奥列格出现的时候起，他那双神色坚定的、好奇的眼睛就没有从他身上移开过。在他的这种目光里和他全部的举止态度里，都有着一种令人崇敬的神气，奥列格也不自觉地常朝他那边望。”（同上书，第281页）

象他这样的赤脚的孩子，在我国各城市的大街上、在學校和实习工厂中可以成千地碰见。在谢廖萨的身上充沛着孩子般的精力，难以抑制的勇敢，这种勇敢在童年时代常具有胡作胡为的性质。但是谢廖日卡的心是纯洁的、真诚的和高尚的。在他的心中充满着行动的渴望、想作着不平凡的、勇敢的、大胆的事业。苏维埃教育制度的良好影响把他的精力引向了正确的道路，使他为了全民斗争的崇高目的作出了贡献。

谢廖日卡完全是在苏维埃时代受教育的；在他童年时代的最初理想中充满了对内战的光荣事迹的景仰。在他的床上悬挂着伏龙芝和伏罗希洛夫的肖像。然后是理想着要作出象夏伯阳和探险家巴巴宁那样人物的功绩。当地长大的时候，又听到了斯达哈诺夫和斯达哈诺夫工作者的事迹。他幻想着要同布琼尼骑着战马奔驰，同契卡洛夫在北极飞行。当德国人攻到柯巴新的时候，谢廖日卡就上前线作战去了。后来到了克拉斯诺顿，抢救了红军伤员，以后又独自一个同德国人作战，收集武器，炸毁被占领有所占据的建筑物。

谢廖萨·邱列宁逐渐成为了一个有坚强的精神力量的人。他成了最坚定、最积极的青年近卫军队员中的一个。

作家顺序地描写了“青年近卫军”的成员。华丽雅·鲍尔茨，这是一个有坚决性格的姑娘，她的性格的主要特点是勇敢和聪明。当她决定去同祖国的敌人作殊死的斗争时，曾同母亲进行了一次真诚的谈话：“妈妈，——她说，——你难道没有看见，不明白我们——我和所有的同伴——过的是怎样的生活？你难道不明白我们不能过别种方式的生活？”

“我的好女儿！上帝保佑你！”无论在校内校外终生都从事反宗教教育的玛丽雅·安德烈叶芙娜说。“上帝保佑你！”她说了就哭起来。（见上书，第579页）。

令人难忘的是“青年近卫军”总部的指挥员万尼亚·杜尔根尼奇，他是一个“具有军人仪表的、面带端庄和刚毅气色的”指挥官，是一个极有原则性的和非常真诚的青年。

奥列格·柯斯秋本是“青年近卫军”的思想鼓舞者和领导者。她给人以“朝气蓬勃、有力、善良、心地纯洁的感觉”（见上书，第61页）。奥列格“有一双大而有力的手”，“一对宽粗而明亮的眉毛”，“暗金色的睫毛”。“他总是兴奋活跃，总是高高兴兴，同时又非常精密、细心、严格。碰到事情只关系他一个人的时候，他还未免要露出小孩子的皮气，——他想亲自去贴传单、烧茅草堆、偷武器、以及暗杀德国人。但是他已经明白他对一切工作和一切人所负的责任，所以总是抑制着自己”（见上书，第636页）。

奥列格喜爱诗歌、音乐、旅行，喜爱自己的土地、母亲、姑娘——他的生活是完美而幸福的。所以他早就怀着青年时代的全部热情决心献身于为教育他、给予他幸福和指给他未来道路的那种制度的忘我斗争。

他养成了顽强性、独立性、正直性格、爱劳动的习惯，“无畏精神，以及对别人的关心”，他力求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从事运动锻炼，参观博物馆，艺术展览会，观看戏剧，并读了许多的书。保尔·柯察金的坚强的、真诚的、刚毅的形象成了他的榜样。当地成了少年先锋队队员的时候，他曾对母亲说：“妈，你知道吗？我要全力仿效保尔、他所做过的一切，我大概是没机会做了。柯察金从小就经受了很多的困难。他和资产阶级和德国人进行斗争。我们只能在书本上看到这样的生活。但是，妈，你知道吗？如果敌人侵犯我们的祖国的话，我会象柯察金一样的去打击残暴的敌人。”

奥列格成为了共青团员。

但是在他的生命当中，他碰到了战争。撤退开始了，接着就是没有成功的疏散的尝试，然后就是重返克拉斯诺顿。为了和侵略者进行斗争，他就开始组织“青年近卫军”。

这样的时刻来临了：把奥列格疼爱得要命的母亲，这时必须对她说出祝福的话，因为儿子快要出发去与可恨的敌人作殊死的斗争去了。她有足够的内心力量来祝福他去进行这个无情的斗争。法捷耶夫描写了母亲和儿子的会见，以及在他们俩的内心中的英雄主义的诞生的难忘的情景。

“我来爱的！我来爱的！”他仰着脸望着她，一面低声说着。“你是一切一切都明白的……我来爱的！”。

“我一切都明白”，她向他低下头，并不望着他，低语着说。

他搜索着她的眼睛，可是她总是把眼睛藏在她的像一般柔滑的头发里，不断低声说着：

“不论什么时候……不论在哪里……别怕……坚强起来……我的小鸟……直到最后一口气……”（见上书第591页）。

在这个特殊时期和公民义务之商战斗争，达到了难以想象的紧张程度。而公民义务是胜利了。

事件展开了。成立了“青年近卫军”组织的战斗司令部，加入这个组织的人要经过严格的审查。每一个加入组织的人都要进行庄严的宣誓：

“我，奥列格·柯斯伏木在加入青年近卫军队伍的时候，对着自己的战友，对着祖国的多苦多难的土地，对着全体人民，庄严宣誓：绝对执行组织的任何任务；对于有关我在青年近卫军的工作的一切严守秘密。我发誓要毫不宽恕地为被焚燬被破坏的城市和乡村，为我们人民的血，为矿工英雄的死难复仇。如果为了复仇而需要我的生命，我一定毫不犹豫地献出它。如果我因为受开枪打或是因为胆怯而破坏这神圣的誓言，那么就让我的名字和我的亲人遗臭万年，让我本人受我的同志们的严峻的手来惩罚。以血还血，以死还死！”

“我，鄂丽亚娜·葛洛博娃，庄严宣誓……”

“我，伊凡·托尔根尼奇。”

“我，伊凡·希姆奴霍夫。”

“我，谢尔盖·邱列宁。”

“我，刘波芙·谢夫卓娃。”（见上书，第487页）

作者继续讲道：

“从他们宣誓的那一天起，他们彷彿断绝了以前的不负责任的友谊关系，进入一种新的、更高一级的关系——思想共通的友谊、每个人立誓为解放祖国土地而流血的友谊的关系。”（见上书，第542页）

不过这样做，另外的方法也是不行的。

对于那些仅仅知道苏维埃社会和自由空气中成长起来的青年男女来说，德国的“新秩序”在每一步都是一个挑战。在

他们的面前从四面八方都长起了 Ordnung (“新秩序”) 的一道墙，而这道墙是必须推倒的。

他们很久以来就过着我们社会中的自由的生活，因此在以前，他们甚至并不是经常都了解这种自由的可贵。只有当缺乏氧气的时候，人们才会了解没有氧气就不能生活。作者在有一个情节中特别鲜明地指出了这一点。

谢廖萨·邱列宁和华丽雅·鲍尔兹悄悄地潜入到他们自己的、而现在已经是空虚的学校的嘈杂的走廊中去，以便从楼顶上窥视着进入到城里的敌人。仅仅在现在他们才感觉到被敌人破坏了的世界是多么可贵而且可爱：“这个世界过去显得是那样普通、平凡、甚至乏味。现在它突然升起在他们面前，却是这样无比地美妙、自由，充满了师生之间的坦白、正直和纯洁的关系。他们那些人现在在什么地方，命运之神把他们吹到哪里去了？无论是谢廖日卡、或是华丽雅的心都要时间张开了，充满了对这个逝去的世界的热爱和对这个崇高神圣的世界的模糊的虔敬，可是当时他们却不知道重视它。”（见上书第235页）

这样，我们就对我们所有的那些东西，对我们所享受到的人民政权所获得的那些成果珍视得不够。我们看到的经常是一些细节和失败，而不去彻底地珍视我们在其中生活的那个美丽和自由的社会，不去珍视我们所呼吸的那种新人和新关系的空气。只有当我们这个在大地上是自由的、最光明的生活制度遭受到了致命的威胁的时候，我们才开始充分地认识和感觉到这一点。这一切都说明，应当更多地珍惜我们所取得的成果，更多地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而努力。

在考验和斗争的环境里，克拉斯诺顿的青年男女每一天都在成长，都迅速地变得很勇敢而聪明了。再继续以社会的态度

给它们所赋予的一切东西，我国社会的伟大学校以及社会主义教育所给予的一切种子都生长起来了，而苏维埃青年人也显露出了他的全部的美和力量。

这个青年人是用广泛的积极的人道主义、对一切劳动人民的尊重和热爱做精神培养起来的。郭勒亚·葛洛摩娃说道：“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能过美好的生活，只要他们希望，只要他们懂得！”（水夫译，青年近卫军，第4页）。

法埃耶夫在这个长篇小小说中成功地详细而多方面地描写了苏维埃人们的道德的纯真。这表现在青年近卫军队员们的相互的关系上，表现在洋溢着奔腾般的热情和男女青年的友谊上，表现在纯洁而审慎的爱情上，表现在母亲和儿子的依恋，表现在青年们所具有的那种光明磊落的思想性上，依靠着它，青年们就去为了人民，为了祖国和为了对祖国的热爱而去作殊死的斗争。

例如，当这两个苏维埃青年，即万尼亚·席姆奴霍夫和奥列格·柯歌伏尔所结成了不可摧毁的战斗的和人类的友谊而倾吐衷肠时这本小说中的这一页又是多么富有价值。

“‘万尼亚！……’奥列格用他的大手抓住了席姆奴霍夫的肤长的手，紧紧地握住，席姆奴霍夫也立刻有力地握住他的手。‘就是说，在一起吗？’

‘当然是在一起。’

‘永远吗？’

‘永远。’万尼亚轻声而严肃地说。‘只要血还在我的血管里流。’

他们面对面望着，眼睛放着光。”（见上书，267-288页）

奥列格·柯歌伏尔和他的同志在花园里月夜下会面了。当作家在叙述这两个青年人的伟大友谊时，在他的语言里是充满

是多么明朗而热烈的感情啊。

“当一个人遇到一个朋友，他的言语、忠诚、勇敢都是始终不渝时，会有多么使人振奋愉快的喜悦、多么难以表达的由衷的感激、多么难以克制的汹涌澎湃的力量攫住他的灵魂！你已经不是一个人在世界上，在你身旁还有一个人的心在跳动！……当奥列格和万尼亚单独相对，倚着在草原上空移动的月亮的光，看见了友人的镇静的、嘲弄的、受了感动的脸和这双放射着善良和力量的近视眼时，他所体验到的正是这种愉快的情感的急流和充塞压在胸口的感觉。”（见上书，329页）

于是这些爱国青年便展开了积极的活动。他们组织了自己的印刷所。在十月革命廿五周年时在城里悬挂了红旗，他们把德国人所赶走的大队的母牛群都驱散了，把德国的守卫杀死了，他们组织了军事俘虏的逃跑，追捕德国兵士，搜索汽车，散发传单，进行了反法西斯宣传，消灭了叛国分子，拯救了青年人，使他们不致于被带走去当德国人的奴隶。

青年近卫军队员们的和年长的同志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但是在这个长篇小说的初稿里这样的领导差不多就没有被显示出来。被留下未领导地下活动的共产党员伐尔柯和苏尔迪很快就被捕了，因而青年近卫军队员们的工作就趋于自流了。

但是应当指出的是这个小说的初稿也正是这样构想的。法捷耶夫在1943年9月15日真理报上所发表的不朽一文中曾论述了这个构思，认为它是在于“指出苏维埃青年，甚至在当他只剩下一个人，没有成年人帮助的时候，也能够表现出党、苏维埃学校和整个苏维埃制度所培养的那种伟大、英勇以及其他最高尚的精神品质”（K·捷林斯基，A·A·法捷耶夫，苏维埃作家出版社，莫斯科，1956年，第170页）。

这样，作者硬力图强调和提出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人民群众的独创精神。固然，这个构思没有什么不好，因此它就有权利被创造性地实现出来。这个长篇小说的受人欢迎便证明了这点。

这个长篇小说之所以受人欢迎，首先因为它有着很多青年英雄们优美形象。但是作者也同样成功地描写了另一个阵营——苏维埃制度的敌人的阵营，在这些人们当中我们可以看见法西斯强盗、隐藏着的社会主义的敌人以及那些在严酷斗争中没有经得住考验的、因而走上了叛逆道路上去的人，不论他们堕落到这条道路上的原因是什么。

在法西斯侵略者的形象中，特别突出的是刽子手和杀人犯芬廉，他是“一个镶着金牙、声音象村妇、戴着浅色玳瑁边眼镜、有点秃顶的胖军官。这位军官身上发出这样的臭味，连宪兵军官巴尔德和宪兵队长勃柳克纳都要皱鼻子，要是军官太走近他们，他们就会通过牙齿缝向他投出鄙视的话。”（同上书，第436页）。

芬廉就象一只鬣狗一样。他不仅亲自拷打了柯斯季叶维奇，折磨和迫害了许多的苏维埃人，而且在他们死后还把他们的枪毙，甚至还把被打死的人的金牙给拔下。他无论什么人都不相信，把所有抢劫来的东西都带在自己的身边。

当他把内衣解开时，就发现了：在他身上缠了一个特别的腰带。这是一个很长的带子，上面有许多许多的口袋，口袋里装满了从受害者那里所拔下的金牙，“这里有世界各国的货币——美元和英国先令、法国法郎和比利时法郎、奥地利克隆、捷克克隆、挪威克隆、罗马尼亚利伊、意大利里拉……这里有着一堆一堆镶宝的或者没有宝石的小件头的金器——戒指、印戒、别针、胸针，另外还有一堆一堆的宝石和金牙。”（见

上书，第475页）。

“站在这些钱币、金牙和小玩意背后的被杀死的、被折磨的、被枪毙的男女老幼是这样多。”（同上书，第476页）。

芬魔的形象无疑地具有着讽刺的特征，而且是个描写得很鲜明突出的法西斯刽子手和破坏者的典型，它象禽兽一般的残暴、疯狂和可怕，就和产生了它的那种制度一样。这种长着两只脚的鬣狗一定要被消灭的。

法提耶夫不仅描写了法西斯仇恨人类的计划的执行者，如芬魔、勃柳克纳和巴尔德等，而且也描写了鼓动他们去干这种罪恶勾当的人，如男爵冯·文采尔将军。和芬魔不同的是“将军是一个有洁癖的人；他一天要从头到脚洗两次热水浴，一次在清晨，一次在临睡前。将军的族长的脸上的皱纹和他的喉结总是刮得干干净净，还洒了香水”。（水夫译，青年近卫军，第251页）。

但是尽管如此，文采尔依然是一个卑鄙龌龊和残忍的人，就如他的部下芬魔一样。文采尔这个刽子手的活动范围更为广泛。如在长篇中所描写的他组织的大规模的屠杀（克拉斯诺顿三十个公民的被杀）。

德国秘密警察和拷问者在自己的卑劣的行径中所依靠的是当地的卖国分子。他们所募集的是什么样的人呢？是伊格纳特·福明——过去的富农。他伪装成一个斯达汉诺夫式工作者而且一直都隐伏着。而当占领者来了的时候，他就保持着一个“警察”的岗位。福明是过去的商人和房主，他决心为德国人服务，以便至少收回自己一部分财产。

另一种类型的叛国分子是斯塔夫柯。他是个小官吏的儿子，按照自己的兴趣和意愿来说，他是属于旧世界，即腐朽的、具有着很狭隘的兴趣、胆小的癖性和意图的小市民世界中的人。

物。

在苏联埃波叔下他得到了工作，但是他只想——活着、吃喝、享乐——不愿意做事情。他对鲜红的领带、漂亮的女人，对外国杂志和一切的外国事物都表现着极大的兴趣。谁也不会怀疑他会有反苏的情绪，因为他的生活很纯洁、和平。但是当德国人来到时他就活跃起来了，并当上了市长。

斯塔霍维奇这个青年人表现了叛卖国家的弱点，他所受到的教育有严重的缺点，他在家里很受溺爱，他的每一个愿望就是法律。他从很小的时候起，就习惯于享受他不应当享受的东西，他很爱面子，很有私。他虽然在表面上接受了一些新的苏维埃人的特质和关系，但是他在内心深处并没有体验到这种民主精神。法捷耶夫说过，如果在艰难的头头在斯塔霍维奇的身边有自己的同志，他也有可能经得起这个拷问。但是当他是孤单地面对敌人的时候，他就经不起这场考验而出卖了自己的同志。这使他的组织受到了可怕的牺牲——死了 56 个人。

有叛祖国的还有一些意志薄弱的女孩儿们，如维丽柯娃和季亚德斯卡雅，她们是一些没有脑筋的小市民。

这部长篇小说中所有的人物明确地划分成两个阵营，这就决定了作品的结构。它是建立在和平和战争的对立上面的，即建立在为社会主义理想的胜利而斗争的人们和企图使整个大地血流成河的那些人的对立上面的。我们在这个长篇小说的头几页里面就已经可以看到这样的对立了——一群欣赏雪白的百合花的漂亮的姑娘和正在进攻的法西斯军队从西方所发来的隆隆的炮声。一切最光明磊落的东西是——人类的美，高尚，勇敢，友谊，青年爱国者们的纯洁的爱情。一切最丑恶的和最无人道的东西是——拷打，兽行，暴力，黑暗势力，死亡，在法西斯主义身上就带着这一切，它不仅破坏了城市而且也破坏了

自然界的美。

在这个长篇中很有力地表现了社会主义的美学，表现了在人民政权的年代里所形成的新的苏维埃人的面貌、心灵、思想和事业中的美。这便是这本书的伟大和意义，它立刻赢得了我们国家和国外的千百万读者们的爱戴和称赞。

但是在1947年12月3日的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社论，这个社论在指出这部长篇小说的高度的价值的同时，也给予了它严厉的批评。当法捷耶夫在创作这个长篇小说时，他所依靠的是他所收集的材料，这些材料说，克拉斯诺顿的青年们由于当时环境的影响而脱离了党组织的领导。真理报的社论指出说，法捷耶夫的这种构想未免肤浅了些。他没有看见党的领导，而把局部情形看成一般现象。实际上党在对敌斗争的一切部门当中照例都是占据着领导地位的。

在社论中还有另外一些不太重要的批评，但是这些批评的正确性没有得到证实。

法捷耶夫接受了批评并大大地修改了这个小说。他从新研究了一些具体的事实和历史文献。这样他就发现了：在克拉斯诺顿曾经存在着严重的秘密的党组织，它领导了“青年近卫军”的活动。但是这个党组织的所有成员在后来差不多都牺牲了。

党组织的领导人是一些很有经验的党务工作人员——普罗庆柯和刘季柯夫，作者仅之在初稿里描述过他们的形象：普罗庆柯是地下省委会的书记，而刘季柯夫则是克拉斯诺顿区委会的书记。他领导了人民和财物的撤退，然后就领导了游击斗争。

刘季柯夫被描写成一个意志坚定、严肃和对敌人严酷无情的人，同时他也是一个细心的教育者，他和奥列格·柯斯伏夫保持着联系，教他保持警惕性。“你们要在自己身上培养一种固守我们的故乡顿巴斯而同情的心理。你可记得我们无—